

焦菊隐文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4

全书分为五章：本世纪现代剧之概况、本世纪之导演、本世纪之舞台美术、本世纪之演出组织、本世纪之演员。每章又分若干节，如第一章之“本世纪现代剧之概况”，共分八节：一、本世纪现代剧之传统；二、本世纪之新剧；三、本世纪之实验剧；四、本世纪之政治剧；五、本世纪之社会剧；六、本世纪之民族及地方色彩剧；七、本世纪之历史剧；八、本世纪之儿童剧。

最新修订版

焦菊隐文集
作品卷

4

作品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目 录

回忆录(片断)

- | | |
|------------|------|
| 我的童年 | (1) |
| 入了小学 | (10) |

早期散文诗

- | | |
|--------------------|------|
| 城外 | (22) |
| 蝴蝶之心 | (25) |
| 火车声 | (27) |
| 雾中的邂逅 | (28) |
| 蝶心 | (29) |
| 邂逅 | (30) |
| 假如我是个弱者 | (31) |
| 遗花 | (32) |
| 夜哭 | (33) |
| 死的美丽 | (35) |
| 犬吠 | (37) |
| 时之罪恶 | (39) |
| 幻想的波澜 | (41) |
| 邻家的佛馨响 | (43) |
| 七月十四日晚怀 C 姑娘 | (45) |

母亲的病	(47)
早晨的愁云	(49)
昨夜	(51)
小朋友	(53)
凄愁的	(55)
翻滚起一大波浪来	(56)
银夜	(62)
一缕青烟	(65)
人间	(70)
槐香	(74)
谁是我的知心	(78)
慰波微	(82)
道一声珍重	(85)
登临	(87)
梦见	(89)
晚穹	(90)
——寄碧兮	
上帝	(92)
诱惑	(94)
泪	(96)
夜行	(97)
归途中	(99)
七夕	(101)
无题	(107)
山游	(111)
他乡	(116)
血碑	(120)

深夜	(124)
寂月	(129)
夜祷	(131)
长夜	(133)
期误	(139)
归家	(142)
日暮	(147)
蔚秀	(149)
幻念	(154)
深夜闻歌	(156)
莫斯科依然雄壮地自豪地举着红旗	(158)
金城江	(161)
有一个残废的瞎子	(165)
看木船	(191)

散文、随笔

不寐	(193)
短篇小说三篇	(197)
——许钦文作	
国家主义的文学	(203)
我们的杂记	(205)
司徒乔的画	(207)
香山消息	(210)
莫尔斯基论杜格涅夫	(212)
葡萄美酒话巴黎	(225)
小巴黎——布鲁塞尔	(232)
从人道主义到反法西斯	(242)

短篇小说

逃婚者	(245)
旧情	(254)
免票	(262)
租界里	(269)
决战	(276)
古瓶	(281)

中篇小说

重庆小夜曲	(287)
-------	-------

回忆录（片断）

我的童年*

我出生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即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申时。

那正是一九〇〇年，即庚子的后五年。庚子年，华北义和团声势极振，倡言扶清灭洋，但最后为慈禧所出卖，引八国联军进陷天津和北京，慈禧逃往西安。次年，和联军各国议和，订了《辛丑条约》。同是这一年，孙中山在惠州起义失败。但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在《辛丑条约》以后，特别在北方起着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办了兴中会，一九〇四年黄兴又组织了华兴会，在湘南起义未成。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

我就出生在旧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情绪也日益高涨的时期。

* 这是焦菊隐未完成的回忆录。这篇童年的回忆是1973年他从团河干校回北京后开始断断续续写的。当时，分派他在剧院劳动，任务不沉重。于是，他利用空隙时间在一个笔记本上开始写作。他想把自己坎坷跌宕的一生仔细地写下来，留给孩子们，留给后代。由于他的视网膜脱落，影响视力，进度很慢。眼睛未治好，医生确诊他患了肺癌，回忆录便无法继续。但这是焦菊隐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弥足珍贵。为了便于对焦菊隐生平的研究，此文编入文集，因为它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宝贵资料。——编者

这也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日益侵入，而封建主义思想还固执地存在着的时期。

我的家庭情况，也由于总的政治和社会情况，更直接地决定了我的思想感情——一种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思想感情。

我的祖先，本是一个官僚封建世家。我的高祖焦有霖（午桥），当过都御史、道光年代的督抚（见《天津县志》）。曾祖焦佑瀛，当过军机大臣、御史。父子二人都是进士出身，天津河东锦衣卫桥焦宅门前悬挂两块“进士第”匾，被称为双匾焦家。焦佑瀛在咸丰临终托孤被委以八大顾命大臣之一，后因反对慈禧执政，与肃顺同谋（见溥仪：《我的前半生》），肃顺被杀，我曾祖充军新疆，缓期执行，以白丁身份，隐居天津，一直到死。这是我取得天津籍的原因。

我的家教很严，高祖、曾祖做的都是言官，所以，从我父亲往上数，四代之间，没有置过半亩地。我的祖父焦骏声系焦佑瀛长子，做的是小官，大约当过山东即墨县尹，也许当过什么地方的道台，也是一个清官，他不到五十岁就死了。我曾祖被革职判罪之后，他当然也就丢了官。全家生活，仅靠我曾祖在天津教家馆维持。当时，我家在天津锦衣卫桥（河东）近郊处有一所两进的小房子。因为我高祖和曾祖都是公正梗直而又廉洁的官吏，天津市民很尊重他们，因此，当时“锦衣卫桥焦家”是很有名气的，虽然家里很穷。

我父亲焦子柯本是四房焦骏年的儿子，后因焦骏年原配刘夫人早丧，继母张氏虐待孩子，焦佑瀛又因大房焦骏声无后，便把焦子柯过继给焦骏声为子。

焦佑瀛和焦骏声死后，父亲焦子柯只是一个秀才，既没有门路去谋官，又没有本钱和本领去经商，就以教家馆来维持全家生活。收入微薄，有时就以变卖一些不多的古玩和古书来补助。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入天津，我家被印度兵抢劫一空，然后纵火烧去大半。我父亲带着我母亲和我大姐（当时大约九岁）和我大哥焦承厚（号积光，1893年生，当时七岁），避难在天津北门乡井王宅，借住在王家的一所破房子的西屋里。

我就是生在天津北门浙江会馆迤东、乡井王宅的这个大杂院里的。

当时，我的亲友们，包括借给我们房子住的这家王家，虽然也经受了变乱，但仍很阔。他们分文也没有帮助过我们。在联军把我家烧抢之后，我父一家四口，粒米都没有。当时，天津的绅士们出头办救济粥厂，施舍穷人小米粥，每天两顿，我家就领了两大口两小口的“赈济”条子，每天由七岁的大哥去领粥度日。这一不幸的遭遇，使得我父亲呼救无门，竟急得犯了神经错乱的病。病势很严重，每天叫喊“毛子来杀人”。他一直病了一年多，神志才恢复正常。

这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对我父亲的刺激很大。同时，也使得他的思想比较开明起来。虽然他的思想还是很封建的，可是穷苦的生活，迫使他不能不抛弃旧的封建家庭中的许多繁文缛节，例如，很早他就不叫我们叩头了，我的四姐焦承训从生下来就不许我母亲给她缠足；同意我哥哥入革命党（当时群众对同盟会员的称呼）等等。又因为他从小就受继母的虐待，虽在官宦人家，却过的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再加上庚子变乱，他的生活习惯一直是朴素节俭的。

我的父亲焦曾宪（字子柯，1867—1937），我的母亲杨君禄（文安县胜芳镇人，1866—1959），生了我们弟兄姊妹六人。我大哥大姐，因庚子之变失了学。我和我妹妹的上学，是后来在千难万险中争取到的。这在以后还要提到。

我家从一九〇〇年到大约一九一〇年，都住在乡井王宅的破

房子中。那一段生活，以及后来我上小学的一段生活，在我的回忆中印象是特别深的。那一个时期（从我生下来到小学毕业的1913年至1914年，大约十五年的时间），我的邻居的生活，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的大哥的政治态度和我的一些阔亲戚对我的刺激，在我的思想意识上，也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住在乡井的时候，我父亲病好以后经人介绍，到扬州一位盐商那里去临时帮忙。由扬州回来后，他就在借给我们房子的王宅，当一名盐商的助手。那时，有一个名叫查慕洲的盐商，拥有天津大沽一带的一片盐田，租用王宅的前院房子，作为办事处，字号叫“查庆馀”，正账（即半经理半账房性质的人物，因为一切仍由查慕洲自己做主）是王宅的王二爷。这位王二爷是我父亲的表兄，把我父亲介绍进去当小职员。生活当然是十分寒苦的，可是已经比前几年靠领粥为生要好得多了。因此，我可以说是出生于一个城市小雇员的家庭。

我们在王宅的破房子里一直借住了有十年之久。那一座房子，给我的印象很深。我的初次记忆，是我大约三四岁或四五岁的时候的一件事。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春天，我还穿着薄棉袄。我在灶台上吃饭，用的是一个木碗。我上边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母亲实在照顾不过来，就请了一位半帮忙半雇佣的保姆，姓温，河北省河西务人。我认这位温妈妈作干妈（义母），是她认我为义子时送我的这只木碗。我还记得，我们住的里外间两间西屋，很小很暗，窗棂都污朽得像墨那样黑。院子里没有南房，东房是王家的一家穷亲戚住，很凶恶，北屋是王家的一门穷本家，一位寡妇带着两个女儿生活。院子当中，是一个垃圾堆。这个垃圾堆，在我的记忆里，真比山还高，至少它的顶峰已和屋顶看齐。可是，在二十年后，大约在一九二八年我大学毕业后，再去访问那座故居，却发现房子大都塌坏了，垃圾堆还在那里，只是

并不太高，只有半房高的样子。

和我家经常接触、来往，有事也互相照应帮忙的，不是那些阔亲戚，他们平时绝不和我们来往，只到在过年、拜寿的时候，我父亲派我到他们家去。我从小接触最多的，是城市劳苦人民和工人。我一生不能忘怀的，是隔壁院中的马大娘。她是一位驯良的老太太，从年轻起守寡，抚养一个独子。她无亲无故，靠帮人洗衣、缝补，或临时落忙，勉强把儿子带大。儿子是当地排子车的纤手，是一种很苦的搬运工。母子两个人时常吃不饱。我们的四邻，都时常周济她。四邻都是很穷的，但也很慷慨，尽自己的力量，或者帮她一顿饭，或者帮她几个小钱，或者给她一件破衣裳。我母亲也时常送给她几个饽饽（即棒子面饼子）。她不“落忍”，总是来替我们缝缝补补。她最疼爱我，我也时常到她家里去玩。

她的家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小院子里住了七八家，她只是在紧靠厕所的角落处，租了一间没有人肯住的小屋子。这间屋子，除去土炕以外，地下大约不能并行走两个大人。她家连一张桌子一张凳子都没有。炕上只有一领破芦席，一条破被子和一张破旧的炕桌，还有一个做针线的笸箩。我不知道为什么，幼小的心灵里，对于这位瘦得皮包骨、脸上被长年痛苦压得神色发呆的老太太，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总觉得她又慈祥、又厚实、又可怜。我几乎每天都要去看她。每当她病倒在炕上，我几乎成天不肯离开她的屋子。

有一天，她的儿子和把头打起来了。为了扣他的工钱，他大概是打死了那个把头。他匆匆忙忙跑回家来，没有和马大娘说上几句话，就远走高飞了。我只记得马大娘哭得死去活来。地方（即保甲长）、巡捕等等，接二连三来找她麻烦，向她要人去抵命。最后，是四邻包括我家具结保证马大娘全不知情，保证她是

良民，并保证一有她儿子的音信，就通知官方，这才渐渐平息。可是，马大娘大病一场，几乎丧命。从此，这位可怜的老人，就更加难过了。

直到我上了小学以后，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左右，我们搬到东门里仓门口以北一个死胡同住的时候（那时离马大娘的儿子出走已有四五年的光景），一天晚饭过后，忽然有人叫门。我大哥出去开了门，神色紧张、偷偷摸摸地把叫门人带到我母亲的屋子里去。我母亲住着一个里外间。那位客人藏在里间，我大哥严厉地命令我，不准我进去，也不准偷听偷看。然后，他就出门了。过不久，我大哥领着马大娘来了，也进了我母亲的里间屋。我母亲把我们看守在另一间屋子里，只有我哥哥陪着他们。我听见马大娘低泣的声音，十分好奇，于是设法溜出去，在我母亲的外屋，扒着布门帘往里张望。这时，我才看明白，来客就是打死人逃跑的马大哥。马大娘坐在炕头上，压低声音哭得很惨，马大哥却是很兴奋的样子，在安慰他的母亲。后来，马大哥掏出一只手枪给我大哥看，并教给他怎样上子弹、怎样射击。我大哥拿枪向门帘处比划，把我吓得连忙跑开了。直到半夜，马大哥才走。我大哥又把泣不成声的马大娘送回家去。

后来，我大哥才对我说，马大哥当了土匪，那天晚上是回来探看母亲的。从那以后，马大哥再也没有回来。马大娘就病得更重了。不几年，马大娘就死了！死的时候，我也去看了，她的遗体就躺在那张仍是一领破芦席的土炕上。是我哥哥向亲友和四邻临时“化缘”，凑了一些钱，买了一口薄木棺材，把她老人家送到“乱坟岗子”埋了的！

从小，为了这件事，我就经常在脑子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人那样阔，又有人这样悲惨？为什么像马大娘这样的人，落到这种下场？人又为什么要去当土匪？后来，我大哥告诉

我，那是叫苦日子逼出来的。人要是活不下去，就要造反的。等到后来我长大了些，我才明白，天下还有无数的马大娘，也有无数的马大哥。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工农红军，不然，我想马大哥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的。

写到这里，就要提到我的大哥焦承厚（积光）。他对我早期的思想，给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后来走的道路，比我经历过的漫长的、曲折复杂的道路，还要庸俗。

我大哥比我整整大十二岁。如前边所提到的，因为家庭败落，他幼而失学。但是，他很好强，一切都是自学的。他向我的大姐夫牛子琴（一位工程师）学习绘制建筑蓝图，学习英文。他又在外边结交了革命党，并且自己也加入了革命党。在宣统年间他才十几岁，当时都还留长大辫子，可是我大哥已经把辫子剪掉。出门的时候，他把一根假辫子钉在瓜皮帽上。外边捉拿革命党的风声很紧，他也不怕。我还记得，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壬子年的年初，辛亥的年尾），我家已由乡井的大杂院迁居北马路国货售品所后身，龙亭西的一个小院落。那时，辛亥的旧年刚过，外边不断响着鞭炮的声音。在壬子年正月十五日的前夕，吃过了晚饭，外边的鞭炮声更密了，但后来越听越不对，西北半边天也红起来了，街上的行人奔跑和惊呼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这时，我大哥匆匆由外边回来，告诉我母亲说：韩家墅兵变了，已经由天津西北，烧抢到北马路了。这时，子弹嗖嗖地从房顶飞过。我大哥胆子很大，仍登在房上瞭望。恰好一颗子弹把他的帽子打掉，他这才下来。这就是有名的“韩家墅兵变”事件。

事后，我哥哥对我说，这是袁世凯玩弄的一次鬼把戏。二月十二日宣统退位以前，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要求把首都设在南京，并叫袁世凯到南京去。袁为了夺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假说华北情况不好，土匪闹事，就暗中布置了一次兵变。这

样，就迫使孙中山辞了临时大总统，而袁继任了临时大总统，并叫黎元洪当了临时副总统。袁的窃国阴谋的第一步成功了，可是天津的老百姓遭殃了。大兵在抢、杀、烧。比如，以提倡国货出名的“国货售品所”，被变兵团团围住，打不开门，就从四面放火，把里面的职工统统烧死在内。第二天我们去看，有些人的肚肠子就挂在楼上阳台的铁栏杆上，人已烧得成灰了。另外，穷苦的百姓，乘机铤而走险，到处去抢米面吃，有人只抢到一下摆米（即用短棉袄的下摆，兜起一兜米），也被保安队打死，或者逮捕了去。次日早晨韩家墅的变兵又回到营盘，一个也没有受处罚，而穷苦的老百姓却被绑起来，在北马路上依次砍头！被砍的人，整整排满了二三里路长的一条北马路，但他们全是饿得无路可走的人，他们的被砍杀，成全了窃国大盗袁世凯。

一提起这件事，我哥哥就大骂，并且时常对我说：一个人为什么活着？不是为了吃穿，不是为了挣钱养家，你要好好想想，你为什么要活着？我是失学的了，你可要好好念书，学成了本领，好救国。我哥哥整整比我大十二岁，我敬佩他正如小学生无条件地敬佩老师一样。他的话我句句入耳。是他，给我指出需要革命的道理，但，同时也是他，给我错指了革命的道路。但这并怪不得他。他的思想是有当时的局限的。而当时整个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也都是有时代局限的。

因此，我从小就经常问自己：一个人为什么活着？我母亲常常念叨一句老话：“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对这种话始终有反感。我认为：人既不为名，也不为声。人要给别人做点好事，为后代做点有益的事。我们应当为了像马大娘那样的人做事。但是，用什么方法呢？争取上学，好好用功。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确实是十分用功的。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全才的好学生。考试总在前一二名，连考在第三名的时候都很少。这

一点，既符合我大哥的希望，又符合我父亲的希望。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希望是不相同的。我哥哥希望我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人物”，我父亲则希望我念好书去赚钱养家。

也难怪我的父亲，他维持不下一个家庭的生活，在阔亲戚面前仅当一个小职员，时常受气、挨骂，他恨不得我们弟兄俩很快挣钱，接过他的担子。我大哥一直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上过学校，父亲很着急，于是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最初，我上小学，他是同意的。但小学一毕业，他就希望我出去工作了。亲友们也讽刺他，说他既然连养家都困难，何苦硬撑面子叫孩子上中学呢？中学他怎能供给得起呢？还有人对他说：你把供给儿子从小学上到大学的钱，垛起来要比他的人还高，将来他大学毕业，准能挣得回来吗？不如叫他从现在就到钱铺（钱号、票庄）去学徒，到了他大学毕业的岁数，他已经是一位经理了。我父亲认为这个逻辑合理，于是坚持我小学毕业以后，到银号去当学徒。我当然反对，但我没有力量。我哥哥坚决反对，支持我上中学，并为我奔走，终于使我入了中学。但也因此，我父亲开始对我很不满意，有时甚至产生恶感。父子的感情是在七八年以后才恢复的。然而，这一场争执，这个矛盾，却无形中在我的意识中产生了巨大的，但又很不利的影响。这我在后边会提到的。

入了小学

为了叙述方便，我把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分开来说，中间夹叙家庭和社会环境对我所起的思想作用。

我父亲最初只准我寄在王宅的私人家馆里读书，因为可以不花钱。王家请的家馆老师是一个新派的旧冬烘，年纪想来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我那时却觉得他很老。我大约是六七岁去就学的。本来，我父亲在家教我读《孟子》，我总是背不下书来，一本《孟子》读完了，只能背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亦将有以利于吾国乎？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以下就再也背不出了。我父亲几次把书抛在我脸上。我也因此有了反感，从小反对背书，后来，在小学读到古文“陶渊明知大义，诸葛武侯不求甚解”，认为实获我心，因此我就更不背书了，长大了，记诵的习惯没有养成，再想背书，却怎样也背不成了。

因此，我父亲就把我送到王家家馆去寄读，老师是新派，教我认“字号”，读小学课本。我的成绩颇好，老师也很高兴。只是，我对老师极不满的一点，是他瞧不起我，因为我穷，而他对于王家和其他阔人家的子弟，却一再从权放纵。

上家馆的同学，也都欺负我。我是一向不受欺负的。只要他们欺负我，我必回击。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反抗性，实际上，这是后来“个人奋斗”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初根源。

因为我家道中落，但我家是书香门第，阔亲戚们虽然有钱，也装作文采风雅的样子，我却认为他们只是有几个臭钱，满身商人气息，我很瞧不起他们。他们不和我们来往，我也不和他们来往。但是，我父亲从我七八岁时起，就处处带着我去走亲戚、拜年、贺寿、吊丧……我不能不去。我穿的比别人寒伧，但别人可不能小瞧我，只要有人对我白眼，我掉头就走。因此，亲戚们在我面前，都不敢说一个穷字，或一句难听的话。

有一天，家馆里乱嚷嚷地喊着（当时是：四个人一个方桌，各人高声朗读各人的课文。老师的戒尺——竹板一响，大家停止，老师依次考问），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表哥王以寻（？）捆了一个纸团，向我的头上抛来。他是欺负我，我一怒之下，就把纸团狠狠地朝他脸上抛回去。谁知他马上拿起纸团去找老师告状说：“焦承志不好好念书，用纸团打人，他的抽屉内还有颜色水。”我喜欢画水彩画，抽屉果然藏有颜色水。老师搜出来，不问青红皂白，打了我十下手板。挨完打，我转头便走，径直到我父亲办公的地方去找他，哭着喊着不再上这家馆了。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叫我停学，托人送我进一家小学。

必须好好介绍这家小学。因为它对我的幼年教育发生过良好的作用（当然也有极为消极的，对我日后思想起着不好影响的作用）。同时，以当时的教育界的人士来说，这家小学的校长，也应当对他有所表扬的。

这是直隶省立第一模范小学，校长名叫刘寿慈，号竺笙。他是前清的举人，当时是教育界的一派新的人物。

这所小学的校舍很大，设备很好，教师的水平很高，教学认真严肃。

在小学的正门外对面，有两个相当大的运动场，一个是篮球和足球场，另一个是田径运动场。校内还有一个室内运动场，当